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9.06.002

新中国70年中国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经验

田克勤¹, 郑自立²

(1.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吉林 长春 130024;
2.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 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对于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经验材料 and 实践数据的分析与考察, 从坚持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 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坚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等三个方面, 对70年来我国在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上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总结。

[关键词] 70年; 中国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9)06-0015-08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实践中, 我们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只有这样, 方可以“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41}。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 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激活其生命力。”而创新性发展就是, “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化的内涵, “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203}二者联系密切, 前后相继, 创造性转化是创新性发展的深度铺垫, 创新性发展是创造性转化的高度升华, 共同推动着我国文化不断进步。“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也是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古人云: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实践中, 我们要做好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工作, 就需要认真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人民在推动中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上的经验教训。

一、坚持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

习近平指出: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3]22}新中国70年来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最首要的一条经验, 就在于从根本上确立、巩固并不断完善了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坚持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 是实现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健康稳步向前的根本政治保证。这一方面是由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决定的。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文情就是,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还不发达。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靠中国共产党, 因为在近现代中国土壤中所孕育生成的众多政党中, 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为社会主义而生的, 也是唯一公开声称要为

[收稿日期] 2019-07-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KS167)。

[作者简介] 田克勤, 男,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 郑自立, 男,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政党。要保持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进而建成发达而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这又是由党的性质和先进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力,不断提升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水平,使之符合人民的需要和要求。

70年来我国在坚持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方面有不少经验,但也有一些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全面胜利,并没有带来文化领域的“根本变革”,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并未因此而“自然建立”,这种状况使得这一时期我国的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些文化产品中不同程度地掺杂着旧有文化的“遗毒”,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党一方面决定组建新中国文化事业领导机构,形成了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及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等部门构成的较为完备的文化工作领导中枢,以有效地组织开展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及其中各种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动;另一方面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以清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化遗毒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核心的文化“破旧立新”运动,并由此而确立并巩固了党的国家文化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此得以步入“正轨”。但在这场文化“破旧立新”运动中,在对某些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着主观主义的偏差。比如,在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主力军——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存在简单粗暴、急于求成的做法,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感情,压抑并削弱了他们参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动的积极性。而在建国初期开展的几场思想批判运动中,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文化转化、创新上的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的错误倾向。这种文化改造上过于求“纯”、求“正”的做法极大地压制了应有的学术民主和文艺创新,强行营造了一元化的文化创造创新格

局,影响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1956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由此进入了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题的新阶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呈现出“曲折中前进”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先后受到了来自“右”和“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这也是导致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经历曲折的主要原因。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之初,党立足于我国文化建设实际,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建设方针,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4]229}“双百方针”的提出,有力地打击了文化建设领域的教条主义倾向,为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社会和舆论氛围,给广大文化工作者更多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其创造创新才能够得到较好地发挥,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因此进入短暂的“百花时代”。在不久,这个“百花时代”便在社会上兴起的一股“右”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下“夭折”了。当时,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言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文化创造创新成就,这在相当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文化恐慌和焦虑。为了遏制“右”倾错误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党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反右派斗争,并且重申了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而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自信。然而问题是,在反右派斗争后期出现了扩大化趋势,“左”倾错误思潮开始在党内蔓延开来,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发展的影响下,开始把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恰当地运用到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领域,很多作家、艺术家被打成“右派分子”,很多优秀文艺作品也受到批判,大大挫伤了他们从事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动的积极性。而随着“左”倾错误思潮在文化领域的进一步泛滥,我国的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始偏离“正轨”,在违背文化发展规律和忽视人民实际文化诉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一状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期达到了巅峰,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事业由此遭受严重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与实践,重新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并作出了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而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入“正轨”,奠定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条件。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总的来看,党一直都非常重视加强和完善对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领导,但其中亦出现过一些“小波折”,存在一些教训。比如,在80年代中后期,党内出现了一种“片面强调物质文明建设而相对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这种倾向造成了党对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领导的松懈,在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上不力,“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5]290}使得许多领导干部及其子弟在西方的“糖衣炮弹”面前“俯首称臣”,走向腐败的深渊,产生了十分不利的社会影响,严重消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一度引起国内思想混乱,甚至造成了社会动荡。邓小平对此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5]290}

新时期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最突出特点是,按文化转化和创新规律办事,注重加强思想引领。新时期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能够较好地处理政治领导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过往那种文化转化和创新从属于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的状况,而是根据文化转化和创新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和规律来加以推动;坚持采用讨论的、民主的、思想教育的办法来解决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加强思想引领,成为新时期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领导的重要经验做法。在新时期,党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即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在结合时代发展实际不断完善这一理论体系的同时,坚持用这一理论体系武装广大文化工作者,从而有效实现了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思想引领。新时期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领导的另一大特点是,坚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党对文化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实现文化管理由小文化管理体制向大文化管理体制转变。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统一揭牌,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新的大文化管理机构挂牌组建,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内部各行业以及文化与相关行业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联动和联治。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从而能够更好地使国有文化企业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发挥其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通过组建一支政治坚定、行为规范、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法律法规支撑体系,促进形成权责明确、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体制,从而为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主体间的竞争提供了有序、干净的市场组织环境。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领导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加强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一是必须增强广大文化工作者的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坚持和维护党中央在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权威和统一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关于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针政策。二是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厘清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与文化创造创新发展关系,摒弃用政治的、简单的、粗暴的方式来解决文化创造创新发展问题,善于发现并按照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创新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来加以推动。加强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思想领导,一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当代中国,要加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引领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必须坚持既要防“左”又要反“右”,要同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作斗争,始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二、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70年最核心的经验。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决定力量,恩格斯指出:“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6]304}这也就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实事求是地回答“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该怎么样推动其发展?”这一根本问题,这是深入推进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宗旨的本质体现,是推进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根本着力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7]257}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所推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一特质,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因为她只有解放了中国全体劳动人民,才有可能最终解放她自己。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作为党所推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应然要贯彻这一宗旨,需要在其中坚持为人民服务方向。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不到保障,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性受到严重压制,毛泽东曾在其所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8]39}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所产生的文化,只能是腐朽的、没落的半封建半殖民文化,毫无先进性可言。为了增进人民在我国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发展人民的、民主的、进步的文化,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1942年5月由中共中央组织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就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的历史命题,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9]857}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9]858}毛泽东在阐释这一历史命题中,将工人、农民、兵士和小资产阶级,这四种加起来占到90%人口的人群称作“人民大众”,强调文艺要为这四种人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历史命题一经提出,就在号召和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符合无产阶级立场的文艺作品去团结教育人民大众,使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推翻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中心任务服务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党秉承马克思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继续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重视和强调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性发挥,并积极为之创造条件。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不俗业绩,但也存在一些教训。其中经验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立法、修法确立和巩固人民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当家做主”地位。这是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性得以发挥的前提和基础。1949年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54年,在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行修订的基础上,我国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二是通过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促进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为人民大众所共享。这有利于提高人民参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积极性,保障人民在其中的合法文化权益。据统计,1949年,全国仅有公共图书馆55个、文化馆896个,乡镇文化站建设基本空白。到了1965年,我国拥有公共图书馆577个、文化馆2598个、乡镇文化站2125个。其中教训则突出地反映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到来自“右”尤其是“左”的错误思潮的严重干扰,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误入“歧途”,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正确航道。这种“偏离”主要体现在两种趋向上:一

是由于受到以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核心内容的“右”倾错误思潮的影响,呈现出企图削弱党对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领导的趋向;二是由于受到过激的以文化专制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呈现出忽视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的趋向。其中第一种趋向,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较快地得到了有效地遏制。而第二种趋向在“文革”时期走向巅峰并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第二种趋向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服务的对象范围趋于狭窄,把工农兵以外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排除在外,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成了“文化革命”的对象。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动被迫机械性地配合政治运动,用单一的、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来要求文化创造和创新工作,充斥着政治路线斗争内容的“样板戏”和“样板作品”是当时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主要成果,也成为当时中国人的主要精神食粮,全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由此也长时期陷于一种“单调”和“饥荒”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基础上,重新端正了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为人民服务方向,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纳入人民范畴,并在实践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探索,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修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进一步巩固人民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当家做主”地位和保障人民的合法文化权益。比如,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对原有宪法做出了重大修订,进一步贯彻和凸显“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并对人民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当家做主”地位做出明确的规定性表述。“八二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又如,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通过制定和完善了《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旅游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多部文化高阶专门法,初步建立了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法规体系。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使得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公民有序参与文化管理事务的频率和规模逐步提升,人大审议的有关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法律法规草案都公开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目前各级政府文化管理职能部门都建立起联系群众、听取意见、接受监督、回应社会关切的机制,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和表达渠道。二是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激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的活力,并进一步增进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上的共享性。比如,在发展文化产业以激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的活力方面,目前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加快,数字内容、动漫游戏、视频直播、视听载体、手机出版等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兴文化业态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这些文化新业态的多样而迅猛的发展,为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实现形式。在发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增进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上的共享性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三馆一站”为核心的较为健全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从2004年起,全国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逐步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开放。从2008年起,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纪念馆开始向社会免费开放,为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10]。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目前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了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为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库和榜样工程。据统计,截止到2018年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3项,位居世界第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40个,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10]。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历史经验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坚持人民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是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这也是最根本的,在当代就是要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

爱国者服务。二是必须加强立法,完善法律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确保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当家做主”地位和合法文化权益,畅通他们参与有关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决策的渠道。三是必须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注重运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促进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三、坚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的凝练性表达,其要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适合中国特点”和“社会主义”是其中两大基本内涵与要求。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11]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实践,基于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教训与巨大代价而取得的经验共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党和人民国家建设经验上的缺失,尤其在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缺乏深刻认识和经验,因此,“学习苏联”成为党和人民的历史性选择。从1951年开始,照搬与推广以“高度集中,计划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国家建设实践的最突出特征。这种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在建国初期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的缺陷和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不仅表现在这一模式下工业化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日趋低下,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受到轻视而发展落后,而且随着这一模式在文化领域的复制与应用,使得文化创造活力受到压制,文化创新性发展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鉴于这一局面,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明确提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

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12]720}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前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可贵探索,为当时的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与出路,我国的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因此呈现出了短暂的昌盛局面,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可贵的探索只是“昙花一现”,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并未能得到很好地坚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这种有益的探索便彻底中断了。正如胡绳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13]413}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由此也走入歧途,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陷入低谷。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实际上就是我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走过4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巨大提升。这40年的发展与成就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其中文化的力量不可低估,当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任何一种成功的发展道路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力量作为支撑。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这40年的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始终能够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力量,并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创造之路。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3]5}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进程中,积累了诸多重要的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汲取中外文化的“养分”。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进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解决得好坏程度直接影响到文化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成效。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上,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基本方针,即要立足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需要,在剔除传统文化的“不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或给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披上“现代衣装”,使之更具现代性;或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其“合理内核”,使之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古为今用”的基本方针,要求做到:要正确把握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精华区分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处理;要遵循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14]4-12} 在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上,必须坚持“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洋为中用”,即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情与需要,大胆吸纳一切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有益的外来文化文明成果。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要求做到兼收与甄别并重,“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5]44}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通过开展顶层设计、理论创新、舆论宣传、制度保障等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活动,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比如,在顶层设计方面,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了总体指导意见。在理论创新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导向带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制度保障方面,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

个方面提供了制度依据,等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营养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开展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制播和对外输出影视剧文化产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发展红色旅游等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比如,在开展对外汉语教学活动方面,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与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建立了548所孔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等等。

三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内涵的核心与本质,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性。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最核心内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我国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亦不能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后,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一直坚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通过开展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建构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文化等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活动,助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断升级与壮大。比如,在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方面,通过制定和实施《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使得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等产权保护有了法律依据;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让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应用有了较好的法律保障等。在建构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文化方面,通过在国有企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推进职业道德建设,推进诚信建设,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奠定重要的价值与道德支撑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历史经验让

我们深刻意识到：坚持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最为紧要。二是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三是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

综上所述，以上这些基本经验反映了，建国70年来党和人民对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主力军、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发展动力、基本方针等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积极探索和科学回答，对我们搞好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

- 社，人民出版社，2016.
-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单行本，2016.
-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EB/OL]. [2019-07-25]. 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5/content_5415076.htm.
- [11] 习近平.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 求是，2019(7).
- [1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3]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 [14] 习近平.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J]. 党建，2014(10).

Basic Experience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TIAN Ke-qin¹, ZHENG Zi-li²

(1. Faculty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Hunan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cultural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reation of a new splendor of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of empirical materials and practical dat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insisting on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cultural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sisting on the people's dominant position in cultural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insisting on the dire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ultural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cultural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been deepl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Key words: 70 Years; Chinese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Basic Experience

[责任编辑：秦卫波]